

彭小平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ZOUXIANG SHIJIE
DE LISHI GUIJI
ZHONGGUO
HAIWAI LUXING
YU WENHUA
JIAOLIU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

——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

——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

彭小平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新波
装帧设计:尹文君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
——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
彭小平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78号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188.000

ISBN7-5438-1959-7
K·351 定价:15.00元

目 录

一、海外旅行游历 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方式·····	(1)
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与对外交流是通过中国	
旅行家进行的·····	(1)
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的特点·····	(3)
中国外交旅行的文化交流特色·····	(5)
中国宗教旅行的文化交流特色·····	(7)
二、开通“丝绸之路” 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11)
古代中国选择向西旅行的历史因素·····	(11)
“凿空”西域，张骞受命首辟“丝绸之路”·····	(15)
张骞所见的西域社会·····	(22)
张骞出使西域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28)
班超再度西出与甘英出使大秦·····	(36)
三、输入宗教文化 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大·····	(44)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地位·····	(44)
法显对佛教经典的引进·····	(47)
《佛国记》与中亚、南亚社情·····	(55)
北魏的宗教外交使者——宋云、惠生·····	(59)
玄奘印度取经与中印佛僧的深厚友情·····	(67)
《大唐西域记》与印度社会·····	(73)
义净浮出南海，对外旅行另辟他径·····	(77)
中国求法僧海外之行对沟通中外文化的贡献·····	(81)

四、“西行”“东渡” 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趋势	(86)
领先的中国古代航海事业	(86)
杜环游历西亚、非洲	(89)
鉴真险渡东瀛, 缔结中日良缘	(92)
鉴真东渡的贡献和影响	(100)
周达观游历考察柬埔寨与《真腊风土记》	(105)
汪大渊对亚非文化的考察与记载	(113)
五、郑和使团“七下西洋” 中国走向世界的高潮	(122)
庞大船队的准备与庞大使团的组成	(122)
“七下西洋”, 空前规模的航海旅行	(128)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的影响与贡献	(141)
郑和远航与西方“地理大发现”之比较	(152)
明中叶以后的闭关锁国与中国对外交往的低潮	(156)
六、列强入侵 没落王朝被迫重新走向世界	(160)
西方殖民者船坚炮利, 清政府被迫派员西去考察学习	(160)
清政府最初派遣的了解西方社会的使者	(166)
工商科技界代表对西方的学习与考察	(177)
清政府官遣海外旅行者走出国门对中国社会的 影响与作用	(190)
七、“钦差”游历海外 全方位了解世界的新方式	(195)
清末关于出国旅行考察制度的规定	(195)
清廷使臣对各国的出访	(199)
首任英使郭嵩焘与他的游历记录	(207)
薛福成欧洲之行与他的《出使四国日记》	(217)
清末政府代表团的出洋游历考察与要求变更政体的 奏折	(225)
出使钦差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作用	(234)

八、认清全球发展方向 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239)
非官遣旅行者对世界各国的游历考察·····	(239)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世界总体发展方向的 认识·····	(246)
结束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思考·····	(260)
参考书目·····	(264)
后记·····	(267)

一 海外旅行游历

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方式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狭小了。然而，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的古代，人们要进行文化交流，所存在的困难则是难以想象的。究竟古代中国人以什么方式走向世界并与外部进行文化交流，又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与对外交流 是通过中国旅行家进行的

当遥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都在萌芽、发展他们的古文明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化。中国是创造世界文明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地理障碍和交通工具落后的关系，公元前的许多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可以说是知之甚少的。当时的中国人以为自己恰恰居于世界中心，所以自称中国；又因为所居住的土地美丽可爱，故而也自称中华。至于被称为汉族或汉人，那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事，亦即古代中国开始了对外文化交流以后的事（此前中国人自称秦人或夏人），此种称谓，一直保持至今。汉人的称谓，亦系中外文化交流史所保留下来的一大特征。

那么，古代中国走向世界和对外文化交流究竟是采取什么形式进行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似乎并没有给予解答。笔者认为，在近代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出现之前，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方式主要是依赖于旅行者到“海外”的旅行活动进行

的。从汉代至清代，究竟有多少人到海外去进行过旅行，已经无法统计；但仅据史籍记载的情况来看，到海外旅行的各类人员也并不算少了。

从汉代开始，西汉有张骞、甘父使团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有百余人，经过天水、陇西、临洮、焉支山，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月氏一带；第二次有三百余人，到过乌孙（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在乌孙，张骞还派员到了大夏、安息（古伊朗）、身毒（古印度）等地。张骞的西行，开辟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汉时，汉王朝又派班超等再通西域，而且班超还派他的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甘英虽未能到达大秦，但他也在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等地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往“海外”旅行的主要是法显等僧人。法显等沿丝绸之路旅行，14年中游历了中亚、印度等30余国。继法显之后向西旅行的先后有智猛、昙纂、竺道等15人和法勇、僧猛、昙朗等25人。北魏末期，又有宋云、惠生等人受朝廷派遣，前往中亚、印度旅行。

及至唐代，旅行达到一个高潮。首先是玄奘等人为求取经，沿丝绸之路旅行到印度；与此同时西行的，还有唐朝派出的一个官方外交使团，由王玄策率领，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王氏所走的是一条与丝绸之路不同的向西旅行路线（均属陆路路线），通称“吐蕃道”，该线使到达南亚的路程缩短了许多。接着，又有义净等从海路到达南洋诸国，在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旅行，开辟了由海路通往南洋和印度的旅行路线。而唐代的高僧鉴真则向东旅行，六渡日本，最后也获得了成功。除此之外，还有唐代著名学者、《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杜环，游历了西亚，还到过非洲，回来后向人们介绍了在阿拉伯各国了解到的特有的异国风情。

元代是中国疆域最宽广的朝代，也是中国人由陆路旅行转为

海路旅行的一个朝代。其前期有周达观等的印度支那半岛之行，后期有汪大渊等的非洲、澳洲之行。汪氏一行从泉州港出发，经海南岛、越南、马六甲、爪哇、苏门达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至西北非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西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达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最后经菲律宾返回泉州。

明代的海外旅行比之元代又进了一步。郑和率领的由数十艘各类巨型帆船和上万人（最多时达 27,800 人）组成的大型官方代表团，曾经七下“西洋”，遍访了南海、北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的 37 个国家，是中国古代海外旅行到达范围最广和地方最多的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历时 20 余载，在中国航海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的航海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自郑和之后，明末清初的封建统治者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海外旅行活动基本中断。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清王朝为了弄清自己挨打的原因，才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海外旅行考察。尽管这种考察是被迫的，但对中外文化交流仍具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的特点

从汉代至明代的众多旅行者中，各个时期出使海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些不同的目的，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首先，由外交出使他国而发展成为文化交流。张骞可以说是西汉派出的第一位政治外交使者。汉初，原来活动在蒙古草原的匈奴族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他们北征丁令、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把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赶走，控制了整个天山

南北地区。他们不时向中原地区侵扰，为害极大。虽经汉高祖的“和亲政策”，但仍未能阻止匈奴族对汉族的掳掠。汉武帝即位后，决定平息匈奴族的骚乱。为了寻找反击匈奴族的政治同盟者，汉武帝派遣张骞为外交使者出使西域，试图联合大月氏以两面夹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后，历经磨难，翻葱岭，经大宛和康居等国，终于在中亚找到了大月氏。虽然，张骞没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使命，但他的旅行活动却为中外文化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通过他“凿空”的“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得到不断交流，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此后，东汉的班超、班勇和唐代的王玄策等，与张骞一样，也是抱着外交目的而作“海外”旅行并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的。

明代的郑和，出使亚非各国的政治外交目的更加明显。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主要是明成祖朱棣想炫耀中国的国威，使亚非各国与中国加强往来。如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回国时，随他来中国访问的就有 19 个国家的使者。其中，淳泥国（位于苏门答腊岛上）国王亲率使团；满刺加国的使团，则包括了国王、王后和大臣在内，计有 150 多人。外国使团在南京访问期间，淳泥国王不幸去世，明成祖便用厚礼把他安葬在雨花台附近。直到今天，这座坟墓还保存着，叫做“马回回坟”，这是明代与“西洋”各国友好往来的见证。而这种友好往来，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为输入宗教旅行而发展成为文化交流。自丝绸之路畅通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据统计，北魏时有寺院 3 万座，僧尼 200 多万。由于当时的佛教经典大都是根据西域语译本再译成汉语的，与正式的梵文经典相比，便有不少讹误增损，加之译经僧人根据传教需要取舍，因而显得很不完备。在此种情况下，从西域辗转翻译过来的佛经就不能满足众多信佛者的需要了。于是，有一批僧人即主动要求

到佛教的发源地去寻取“真经”。这样，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直到唐代，僧人们便掀起了西行求法的热潮，其旅行的终极目的大都为印度。这一时期，从法显开始一直到玄奘，作“海外”旅行的绝大多数人都与求取佛经有关（唐代唯有鉴真除外，他东渡的目的则是要在日本弘扬中国佛教）。正是在这种求法取经的过程中，旅行者们把中亚及印度等地的文化输入到中国，并发展成以宗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艺术交流。

中国古代的海外旅行者，如果与西方同时期的涉外旅行者相比，其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的缘故，古代中国以商业为主要目的涉外旅行为数甚少。与此相反，西方的涉外旅行，绝大多数都是商业旅行或探险旅行，即使有宗教旅行者，其目的也是为了向外宣扬或传播本国某一宗教的教义，而不像中国旅行者到他国旅行是为了寻找或获取他国宗教教义。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特点，中国古代海外旅行者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特别突出。

中国外交旅行的文化交流特色

不管中国古代的海外旅行者带有何种目的，他们的旅行活动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作用，而且还各具特色。就外交旅行来看，其特色为：

首先，通过旅行，使古代中国了解了外部世界，打破了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如西汉张骞回国后他深感国人原来对世界认识的错误，惊叹地对朝廷官员们说：“世界真大呀！这次出使，才明白天外有天，国外有国了”。^①东汉班超之子班勇在中亚之行后，为让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将其旅行见闻撰成《西域记》一

^① 参见《史记·大宛列传》。

书，具体介绍了乌弋山离（今巴基斯坦俾路支地区）、条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天竺（古印度）、车离（今印度南部）、栗弋（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严国、奄蔡（今里海一带）等 11 个葱岭以外国家的情况。

其次，通过旅行，促进了中外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引进了许多外地的良种和农作物。如畜牧业中，引进了乌孙的“天马”、大宛的“汗血马”等优良马种，促进了中国养马事业的发展。在农作物中，从西域传入的瓜果、蔬菜、豆类等，品类繁多。其中以葡萄、苜蓿、石榴、黄蓝（一种花，可入药）等尤为著名，对内地的畜牧业及医药方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蒜（大蒜）等，一经传入中国内地后，便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在西域农作物及其栽培技术传入内地的同时，内地的生产工具和某些生产技术也传向了西域。其中对西域人民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有二：其一有铁器和冶铁技术。张骞通西域以前，西域人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铜器。《汉书·西域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是汉朝使者和随员教会他们铸造铁器的技术。中国内地的铁器不仅输出西域，而且还远销罗马和印度。罗马学者博里尼在其所著《博物志》中对中国的铁器大加称赞，认为是优良卓越的产品之一。^① 其二为水利灌溉与凿井技术。据《史记·大宛传》载，汉武帝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由此可见，大宛学会打井技术，也是由中国旅行者传过去的。

在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其表现更是丰富多彩。张骞通西域前，汉代流行的歌舞，大都是楚歌楚舞，如刘邦的《大风歌》就

① 安作璋：《西汉与西域关系史》第 140 页，齐鲁书社 1979 年版。

是楚歌，他的宠姬戚夫人即善楚舞。至于当时配合歌舞所用的乐器，主要还是古代遗留下来的钟鼓磬钲之类的打击乐器。汉武帝以后，由于西域的乐舞传入，中国内地的音乐和歌舞便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如西域的箜篌（印度乐器）、箜篌（中亚乐器）、琵琶（印度、波斯乐器）、胡笳（匈奴乐器）、胡笛等一类的乐器，大都随汉朝的外交使团传进中原，后来相继成为宫廷或民间的主要乐器之一。又如汉乐府中的《鼓吹曲》等乐曲，亦自西域传入。班超在西域欣赏时，见其声调雄壮，便带回内地，后来一直到唐宋时还采用它，仅偶或根据主题别谱新词而已。西域的舞蹈和杂技，亦随汉代使者陆续传入内地。西域舞以姿态矫健、跳跃翻腾为特点，故而傅毅《舞赋》有“浮腾累跪、附蹈摩趺”的描绘。裸体舞纯系外来歌舞，出自印度或东南亚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裸体舞的石雕，在南阳画像石上还可见到。西域杂技的传入，以其艺人来内地表演为主，他们的人兽搏斗、吞刀吐火等节目，对中国杂技亦有很大影响。西域文化艺术在内地的传播，以班超父子出使西域时为高潮。汉灵帝在位时（168—188年），特别爱好西域艺术和风俗习惯，经常穿着胡服饮宴作乐。在他的倡导下，首都洛阳盛行西域风尚，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舞、胡乐成为上层社会奢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来自中亚、西亚和印度，流行于西域的风尚逐渐和内地的汉文化融合在一起，变成东汉末年黄河流域流行的习俗。由此可见，外交旅行者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成就是显著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中国宗教旅行的文化交流特色

如果说，中国古代外交旅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侧重于物质文化、艺术文化和饮食服饰文化方面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宗教旅行在文化交流中的特色则表现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文化方面。

中国求法僧的海外旅行，自魏晋开始，经南北朝和隋唐，直到北宋初年才告中断，历时约 800 余年。虽然，他们的旅行只是为了振兴佛教，所追求的也不过是一个渺茫的来世乐园，但他们在沟通中外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和科技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远远超过了他们西行取经的主观目的。他们在文化交流中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求法”的海外旅行，促进了古代中外思想、科技文化的广泛交流，在东方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取经和译经，是求法僧们西行的主要目的。中国求法僧在印度各地，搜集了一大批梵文正本经典携归中国，转梵为汉，把梵文佛经直接译成汉文。佛经翻译至南北朝时，便已译出 1, 621 部，计 4, 180 卷；到唐代贞元五年（789 年）又译出 492 部，计 2, 713 卷。佛教经典的传入，对中国文学、哲学、医药及艺术的发展，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佛经的翻译，又正是吸收外国文化的一条途径。夹杂在佛经中的大量天文、历法、哲学、文学、医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便为中国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新鲜血液。例如，中国文学就从佛经中汲取了养分，使词汇与体裁都得到了丰富。像表示时间短暂的名词“刹那”即是玄奘译经时确定下来的；唐代变文这种文学体裁亦起源于佛经演讲。

求法僧的取经和译经，还为东方文化保存了大量典籍。如法显去印度时，北天竺各国的佛经还是师徒口授，并没有文本，法显在佛教中心连弗邑掌握了梵书梵语，写录了经律，把许多口传的佛经记录下来。此举对佛经的流传，对东方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都具有重要意义。玄奘回国后，还进行了中文译为梵文的工作。《大乘起信论》这部佛经在印度本土失传已久，是玄奘根据中文本回译成梵文，使之再流传于其本土的；他还应印度鸠摩罗王的请求，把中国古代卓越的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使其

传播于印度。总之，中国求法僧的取经译经工作，既丰富了中国原已十分光辉的文化宝库，也为印度保存了珍贵的文物，在中印文化交流和发展东方文化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

第二，求法僧的海外旅行对中外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不但是一个酷爱历史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酷爱地理的民族。历史方面，除了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以外，还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其他各类史籍。在地理方面，很早也有了地理著作。不过，有关外国地理的书籍却不多见，正是中国的求法僧们弥补了这一缺陷。西出旅行的僧人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既喜爱历史，亦喜欢地理。在“海外”旅行的过程中，每每记下沿途所经之地的山河形状、地理特点和旅行里程，旅行结束时，即形成为某种地理专著。比如，法显的《佛国记》、释道安的《西域志》、昙景的《外国传》、法盛的《历国传》、智猛的《游行外国传》、道普的《游履外国传记》、惠生的《行传》、宋云的《行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等，既可视作历史著作，也可当作地理著作。其中，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中国地理学和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理学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的记载不仅有自然景物的描绘，而且有沿途地区的交通路线、地理位置等诸方面的详细情况，对当时和后人明了中国古代东西方商业、文化交往的几条主要路线极有帮助。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称誉《佛国记》为西域旅行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①。

印度民族是一个伟大的非常有智慧的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哲学、自然科学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世界文化的

① 靳禾生：《旅行家法显》，第2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印度民族性格中却有一个弱点：即不大重视对历史的记述，对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都难免有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所以，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历史”之叹^①。后人要想认真研究印度历史，尤其是印度古代史，除了依赖外国人的记载外就无法进行。因此，凡是古代到过印度旅行的记载，都成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稀世之宝。于是，中国求法僧们的各种旅行记载，即成为研究印度中古时代历史最丰富而又最宝贵的史料。对此，印度学者给予了高度赞扬。如恩·克·辛哈等人认为：“中国的记载对印度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的历史的重建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② 潘尼迦则说：“除去《戒日王本行》以外，我们有伟大中国取经者玄奘所遗留下来的独特无二的记载，……他的旅行纪事是我们所有的关于印度的第一幅完全的画面”^③。

中国求法僧的旅行纪事，还推动了中外考古学的发展。他们对古印度许多城邑和寺院地理位置的描述，为今天考古发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近现代的考古学者，依据《大唐西域记》对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文化的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陆续把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的古寺、阿旃陀的石窟、那烂陀寺的遗迹等，都一一发掘出来了。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9页。

^② 参见恩·克·辛哈：《印度通史》（中译本），第1册，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③ 潘尼迦：《印度简史》（中译本），第96-97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二 开通“丝绸之路” 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勤劳勇敢的中华各族人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民就和邻近的一些国家有了友好往来，迄今为人称颂的“丝绸之路”，就是西汉时期中国人最早开辟的向西进行“海外旅行”的一条友好路线。通过这条旅行大道，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着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促进了世界的共同进步。

古代中国选择向 西旅行的历史因素

古代中国人为了求得和世界各国民族进行友好交往，在寻找海外旅行的道路上是费尽了周折的。他们东行日本，为大海所阻，只留下了“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他们向南进发，也只能是面对南海，望洋兴叹；在他们的北面，除了强大的蒙古游牧部落进行阻拦外，他们也无法战胜冰天雪地的寒冷气候，不可能开通向北旅行的道路。唯有向西旅行，才有可能与西方世界进行友好交往。

为什么只有向西旅行才有可能与西方世界进行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呢？除了地理环境的因素（有陆路相通）以外，主要还是由当时的历史因素所决定的。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西部地区与西方世界的文